

《省克記》的史料價值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蔣中正總統五記》中的《省克記》是摘自蔣氏 1915 至 1943 年日記中關於自我反省的記載，由其秘書王宇高、王宇正兩人，以編年體的方式，分類摘抄、編輯、整理而成。此一史料可讓我們了解蔣介石如何修身，以及他的修身思想與處世、治國理念之間的關係。「省克」意指省察與克治：即反省與體察自我行為中的過失，透過檢討與修正的過程，達到個人人格境界的提升。

「省克」為宋明理學的專有詞彙。蔣介石的思想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他熟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以及各類理學經典，其中又以王陽明的著作如《傳習錄》等最為重要。他的理學在近代思想史上是接續了梁啟超所開創的一種結合了傳統的「江右王學」與日本明治時代所發展的現代陽明學而成的思想系統。梁啟超於 1902 年出版的《德育鑑》一書中，亦有「存養」與「省克」兩章。書中指出存養、省察與克治三種修養工夫，是環環相扣、緊密相連的。蔣氏省克思想即源於其理學背景，此一觀念奠定他以修身為起點，進而治國、平天下的基本關懷。

《省克記》所透露蔣氏的省克生活，正是結合了存養、省察與克治三者，書中記載「公少秉母教，母教嚴，時時自儆惕，不敢少縱……及十九歲，從鄞顧清廉先生游，見顧先生治性理之學，尤重變化氣質，益知省察克治存養之功，乃為人所必不可少者也」（1915，本書頁 1）。這三者貫穿在蔣氏心

念轉動、日常作息、待人接物，甚至是國家大事的決策之上，成為他每天的例行工作。

蔣氏省克思想的實踐源自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自訟」（語出《論語·公冶長》：「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的想法，亦即藉如日記等的書寫，抒發內心的聲音，甚至對言行評分而達到自我批判的目的。同時，記載的內容並非私密，而是可供他人參閱。

我們在翻閱《省克記》時，會發現蔣氏自訟的一個重要根基是「羞恥感」。由羞恥感而產生的「雪恥」（意指消除外人給你的羞辱）觀念，因而成為蔣氏日記中最常看見的用語。蔣氏的「雪恥」來自一種強烈的自我責任感，其來源為「天地父母生我」與「總理期我」兩大原因。首先，為了報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將不孝與恥結合的想法，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其次，蔣氏一直以孫中山先生的信徒自居，要實現總理未能完成之事業。這樣一來，省克是為了不辜負父母與總理之期望。

蔣氏的省克生活也受到基督教影響。《省克記》中記載：「余為革命黨員，今又受耶教洗禮，故三民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耶穌教義乃余精神唯一之信仰，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己，永矢勿怠」（1930/10/24，本書頁48）。在面對挫折不順，如軍事上之困境時，他亦會祈求上帝護佑，「如能得上帝保佑黨國，

於雙十節以前，能平定兩廣更好，否則，亦惟有聽之，且先擊破赤匪之主力可也」（1931/8/22，本書頁55）。大體而言，基督教對蔣介石有兩方面比較明顯的影響。第一，使他能堅忍不拔地面對橫逆與困境，將自己與黨國命運的起落與上帝的信仰結合。第二，讓他重新思考「人定勝天」的原則，而了解到天人關係。蔣介石於1930年前的日記中，慣常出現這四個字，在其接受基督教信仰後，突然不再書寫此四字。換言之，蔣氏過去「戡天役物」的豪情，此後轉為對上帝的崇敬並接受上帝的啟示與安排。

在理學與基督教的雙重教誨下，蔣介石幾乎每日都進行對於個人道德缺失或是知識、行為缺憾的反省活動，顯見蔣氏一生都不斷試圖與個人的種種缺點對抗，期望能成一聖賢。他曾感嘆地說：「憶少時聞人稱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學術，周公文武之事業，常自思念，可惜已前有古人矣，否則，此學術，此事業，由我而始，豈不壯哉！常存不能做自古以來第一聖賢豪傑之歎」（1931/3/21，本書頁51），顯然聖賢、豪傑之志長存其心。

自《省克記》內容看，省克的對象首先是生活舉止、個性脾氣與情欲發抒等方面的缺失；其次則包括知識不足、處事不當等；甚至是夢境的內容也是檢討的對象。生活舉止、個性脾氣與情欲發抒等缺失又可再作分類，第一種過錯是個人生活習慣與個性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懶惰。他寫到：「近日起居

無度，晏安漸深，國家重任，豈可輕忽！今以後夙夜匪懈，矢勤矢勇」（1930/11/10，本書頁 48）。他常擔心自己因失眠而晚起，或睡過頭（他稱為「濡滯」）。他決定每日都應該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六時起床。對蔣介石來說，無法安眠或者因為體力漸衰，又或者因為修養不到家，使諸事煩心、心神有愧所致，應盡量避免。其次是舉止失態。蔣氏盛怒下會「擲杯撕卷」（1931/9/22，本書頁 55）；或因驕矜、暴戾與急躁而發怒罵人，如「動輒發怒大惱，可知此氣毫未修養，與二十年前無異也」（1932/7/18，本書頁 65），甚至動手打人（1931/3/27，本書頁 52）。對於這些行為，他都會自責，而不斷要求自己勿再犯，能夠「勉之、戒之、戒之」。再其次是奢侈無度與好名之念。最後則是情慾方面的困擾，包括思邪心蕩、狹邪之行、手淫等。我們都可在《省克記》裡尋得蔣介石這方面的記述，例如：「色慾漸減，修養到不動心地步，自信可能也」（1935/2/2，本書頁 93），「本身性質之變化，形而上者為多，忍耐公正，日有增進，躁急雖未全改，而私慾色慾已滅絕矣」（1935/12/31，本書頁 104）。

至於知識、行事缺失的部分，他時常反省自己知識不足、用人處事之不當與戰事失敗等。他說：「誅不避親，舉不避仇，吾果能之乎？」（1940/6/1，本書頁 172）；「率眾治國，總以修身克己，為唯一要道，勉之！」（1941/11/22，本書頁 201）。於此，

蔣氏更特別關心剿匪失敗、失卻大陸等問題。其所敘述者，包括國軍的組織、宣傳、諜報戰不如共軍；國民黨的黨務紛爭、黨紀敗壞（如幹部腐化墮落）、能貫徹總理遺教，以及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他記載：「本週以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情況漸惡，故日夜憂慮；而將領疏懈，不求上進，尤為悲憤」（1943/5/30，本書頁 234），希冀對黨或黨員進行全面的改造。我們若從儒家傳統角度來看，蔣介石所反省的過錯，大致涵括了傳統儒學之中「尊德行」、「道問學」與「經世」等三方面的表現。

上述各種缺失，便是每日迴盪於蔣氏內心的課題。對他來說，對於過錯的後悔即是知恥，也是自我追求道德提升的重要方法。因此，為求改正缺點，他常「靜坐省過」、做「朝課」與「晚課」、禱告等來自我檢討；並利用傳統「功過格」的方法，記錄錯誤來警惕自己。例如，他記到：「對下暴怒，傷神敗事，後悔無及，記大過一次」（1935/4/30，本書頁 107）。

揉合自訟、功過格的傳統修身方式，加之基督教的影響，蔣氏的省克之法，其實是依賴一套特殊的記憶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要吸取失敗經驗以悔過自新。在這方面，基督教的背景不容忽略。記憶是基督教悔罪傳統中相當關鍵的環節，如利瑪竇便擅長記憶術，著有《記法》一書，教導中國士大夫建立一座「記憶之宮殿」，來悔罪反省，充實知識。蔣介石的記憶術，

是透過勤寫、反覆閱讀日記；靜坐默禱或抄錄聖賢、《聖經》之佳句；設立座右銘；或作曲唱歌、透過旁人規勸等方式，結合而成。他尤其看重日記，規定自己「以後當日記治軍、用人、看書三者各一則，以自課也」（1929/1/14，本書頁31）。若不寫日記，「如此弛懈荒落，尚何論雪恥？更何論革命？」（1928/9/14，本書頁28）。靜禱之功，則如「民國七年，公年三十二，是年每晚靜坐默念自儆者：一、萬象森然，沖漠無朕；二、去人欲，存天理；三、心體、意動、致知、格物四句要訣；四、靜坐收心之條；五、紛雜思慮之條」（1917-1918，本書頁1-2）。至於作曲唱歌，蔣氏於1928年11月21日清晨時刻，因念及濟南慘案而作歌曰：「五月三日是國仇，國亡豈許你悠游？驕傲懶惰無廉恥，不懼大禍來臨頭！親愛精誠，團結一致，共同來奮鬥！革命革命，犧牲犧牲，黑鐵赤血，求我國家獨立平等又自由！獨立！平等！中華民國真自由」（1928/11/21，本書頁30）。除此之外，蔣介石還需藉由座右銘與旁人的規勸，來省克己身。如1919年，蔣氏請孫中山書寫「靜敬澹一」，置於座右（1919年，本書頁2）。這種借助他人提醒的方式，圍繞在蔣介石身旁者，如幕僚人員（如侍從室）亦偶爾會盡一份心力。不過，真正能發揮影響的人可能只有其妻宋美齡。日記常會提到「美妹規我」，然有時亦記載兩人吵架，顯示他未必能完全接受宋的看法。

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也反映在他對夢境的態度。他認為晚上做惡夢是智德不足的反映，因此在起床之後需立刻檢點。例如：「夜之所夢，必為日之所思，所思未能誠正，而且有日下之趨勢，此人生之至危也，應如何戒懼而改之！」（1943/4/9，本書頁231）。另外有些夢境是代表他對治國失誤的警訊；先輩之教誨與督促；又或者牽涉事業成功之佳兆，如未來太平康樂與共毛必滅等。如他曾夢過自己斬殺長蛇，這可能象徵了蔣氏的帝王氣魄，與力戰日軍的企圖（1943/2/5，本書頁230）。其他類的夢境，較有趣的是夢到一尾毛毛蟲，被蔣介石踐踏斃之，此即顯示「上帝佑我中華，示我以共毛必滅之預兆乎」（《日記》1944/3/15）。綜言之，蔣介石對夢境的仔細記載，顯示他省克的範疇包括白天有意識的種種作為，也包括夜晚（或許無意識或潛意識）作夢時心中的恐懼與期待。

閱讀《省克記》可以發現，蔣氏深具源於道德感與責任心的反省能力，此一人格特質與思想傾向是蔣介石能成就一生事業的重要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省克記》是蔣介石命秘書摘錄《日記》而成的，其內容經過編輯與篩選。如果想要對此課題有進一步的認識，尚須將《省克記》之內容對比其他的史料，例如《日記》、蔣氏所評點的《聖經》、《荒漠甘泉》等宗教書刊，以及他所發表的公開文件、書信等，方能較深入地認識其內心世界。